

2022年度“中国考古新发现”揭晓

为何这六个项目能够入选？

“2022年度中国考古新发现”揭晓。湖北十堰学堂梁子(郧县人)旧石器时代遗址、河北尚义县四台新石器时代遗址、甘肃庆阳南佐新石器时代遗址、河南安阳殷墟商王陵区及周边遗存、云南昆明河泊所青铜时代遗址、宁夏贺兰县苏峪口西夏瓷窑址等6个考古项目入选。

“2022年度中国考古新发现”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,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承办,是中国最新考古信息的交流平台。为何这六个考古项目能够入选“2022年度中国考古新发现”?它们有何重要性?

1 湖北十堰学堂梁子遗址：

发现“郧县人”3号头骨,实证我国百万年人类史

学堂梁子遗址位于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青曲镇弥陀寺村。因于1989年、1990年发现两具直立人头骨化石(俗称“郧县人”)而闻名。2022年5月18日,“郧县人”3号头骨面世,是迄今欧亚内陆发现的同时代最为完好的古人类头骨化石,保留了该阶段人类重要而稀缺的解剖学特征。

2 河北尚义县四台遗址：

中国北方新石器考古实现重要突破

四台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尚义县石井乡四台蒙古营村南,是近年冀西北地区发现的一处面积最大、保存完整、具有重要价值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。

它不仅填补了燕辽考古文化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研究空白,而且为解决旧一新石器时期过渡、农业起源、文化谱系、人类群体从流动性向定居形态转变、草原丝绸之路形成与发展等一系列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材料,是我国北方地区万年文化史的实证。

3 甘肃庆阳市南佐新石器时代遗址：

揭开5000年前大型宫殿建筑的神秘面纱

南佐遗址位于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西南6公里的后官寨乡南佐村,发现了年代最早、布局严整的“官城”,以及5000年前中国规模最大、保存最好的大型宫殿建筑。

这对研究仰韶文化晚期泾、渭地区的社会形态及其性质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,也是黄河流域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实物资料,对于认识黄河中游、黄土高原尤其是陇东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的关键地位,探索早期国家起源,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。

4 河南安阳殷墟商王陵区及周边遗存：

推动商代陵墓制度、商文化的研究

殷墟王陵遗址位于安阳市洹河北岸的武官村北地,是中国所有古遗址中发掘时间最长、研究成果最为丰硕的遗址,被誉为“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摇篮”。

目前,殷墟商王陵区新发现2个围沟、400余座祭祀坑,指向了商王陵区东界在王陵公园东墙以东100米的南北一线。这些发现改变了商王陵陵园的格局,将推动对商代陵墓制度乃至商文化、商史的研究。同时,也为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。

5 云南昆明河泊所青铜时代遗址：

出土汉代字简牍1300多枚、封泥837枚

河泊所遗址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,是一处周代至秦汉时期的大型遗址。目前通过考古勘探发现地下保存十余处台地与河湖沉积,年代从先秦时期一直延续到秦汉时期。

最大的突破在于出土了封泥837枚和有字简牍1300多枚。大量行政、司法简牍与官印封泥是汉代中央政府在云南行使治权的体现,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实证。

6 宁夏贺兰县苏峪口西夏瓷窑址：

发现最早的西夏瓷窑址

苏峪口瓷窑遗址位于宁夏贺兰山苏峪口内,为一处西夏时期精细白瓷手工业生产遗址。遗址面积约4万平方米,发现窑炉13处。

苏峪口瓷窑遗址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西夏瓷窑址,揭示了一个全新的窑业类型,首次在浙江上林湖以外地区发现大规模用釉封匣钵口的装烧技术,首次在西北地区发现在瓷胎、瓷釉和匣钵中大量使用石英的制瓷技术,填补了西北地区精细白瓷烧造的空白,复杂的窑业面貌也反映了两宋与西夏经济、文化交往交流的历史。

据新华社



“郧县人”3号头骨



河北尚义县四台遗址出土的磨杵与盘。



甘肃庆阳市南佐遗址出土的骨器。



殷墟祭祀坑K23出土的青铜器。



云南昆明河泊所遗址出土的瓦当。



苏峪口瓷窑址出土的瓜棱罐与匣钵。

□雍小雅

清光绪二十五年(1899),一位28岁的桓台青年和大哥一起来到黄河边的泺口,最初他们与人合办粮栈,继而独资创办聚合粮栈,赚得第一桶金后,又进军面粉、纺纱业。这位桓台青年就是济南工商界的传奇人物苗杏村。至今,关于他的创业故事还在济南坊间流传。

从清末到民初,数不清的外地人像苗杏村一样来到泺口,从学徒、搬运工做起,历经艰苦创业,成为小老板、大老板。而泺口,之所以能成为他们实现梦想的起步区,则因为其得天独厚的航运之利。

泺口,因地处泺水入济水处而得名。早在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所著《水经注》中便有记载。金元明至清中期,依仗大清河航运之利,泺口商贸兴盛,素称“巨镇”。据记载,明代泺口镇位于大清河北岸,对岸称“泺口南岸”。清代,泺口镇因河而南北对分,分别称“泺口镇河南”和“泺口镇河北”,嘉庆年间,鹿松林《泺口春日》诗作中有“千家分两岸,一水在中央”之妙语。咸丰五年(1855),黄河改道夺大清河入海后,泺口两岸备受水患。光绪十六年(1890),山东巡抚张曜将泺口险工修成石坝,方解河患。从晚清起,泺口南岸逐渐发展为泺口镇主城区,时称“南泺口”,北岸则逐渐成为附属,称“北泺口”。

大清河时期,泺口为大清河运盐一大总汇。清光绪二十一年(1895),黄水淹没利津永阜盐场,此后,海盐改由羊角沟小清河运至历城县黄台桥。此重大变故后,并未动摇泺口的航运地位。因为运抵黄台桥的盐,还得运到泺口盐垣,再经黄河转运到各地。光绪三十二年

(1906),自黄台桥通往泺口的清泺铁路建成,两河联运更有了便捷通道。黄河夺大清河之后,河道运力提升,往来船只数量增多、载货量增大。民国时期的泺口大盐划(船型之一),大者长25米,宽4米,可载货30吨。下航时顺风顺水每日行230里,无风行五六十里,上航顺风顺水每日能行百里。

泺口是黄河山东段装卸量最大的港口。山东黄河的水运货物集散以泺口为中心,沿黄各县由水路运送的农副产品,几乎全在泺口卸载,再发送济南城或沿津浦、胶济铁路运往各地。各县所需的物品,亦由泺口装船运达。泺口沿岸泊船之地长三四里,自西而东,分称上、中、下三关。1933—1937年,为山东黄河船业最盛时期,黄河山东段有三千余船只来往运输,泺口全年进出装卸货物船只计2万余艘次。

1937年前,水铁联运催生了泺口镇的繁荣。当时,泺口镇有居民四千余户,周围有周长8里的城墙,城内设公安分局、水上警察署、斗捐局、河务分局、官船局、盐运局、邮政局、电报局等各种公署及服务机构,市面繁荣,店铺约有150家,其中,进行大宗粮食买卖与转运的粮栈十余家。1937年版《中国通邮地方物产志》一书,收录泺口镇商号63家,其中,经营米麦杂粮者29家,经营盐酱油醋者19家(泺口醋年销量24万公斤),林矿制品5家,金融及其他商号10家。以商号总量而论,当时泺口镇堪称“山东第一镇”。

(本文选自济南市档案馆编《照片里的黄河故事》一书,山东齐鲁音像出版有限公司,2022年11月出版)

泺口镇迎来『高光时刻』

——济南黄河故事⑩



1929年拍摄的泺口老照片。